

经济伦理学译丛

未名译库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地方智慧与全球商业伦理

LOCAL INSIGHTS, GLOBAL ETHICS FOR BUSINESS

〔美〕金黛如 著
静也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朱名译库

·经济伦理学译丛·经济伦理学译丛编委会主编

地方智慧与全球商业伦理

Local Insights, Global Ethics for Business

[美] 金黛如 著

静 也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方智慧与全球商业伦理/[美]金黛如(Koehn, D.)著;静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未名译库·经济伦理学译丛·5)

ISBN 7-301-06941-3

I. 地… II. ①金… ②静… III. 商业道德-对比研究-中国、日本 IV. F7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0784 号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4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Local Insights, Global Ethics for Business

by Daryl Koeh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ryl Koehn.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书 名: 地方智慧与全球商业伦理

著 作 责 任 者: [美]金黛如 著

译 者: 静 也 译

中文版责任者: 罗世范

责 任 编 辑: 张晓蕾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06941-3/F·0776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54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82866441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0.5 印张 302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入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瀛、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驊、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

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羨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颜保、张世英、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芑、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的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大型的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我社即将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学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把“未名译库”真正建成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 年 3 月

“经济伦理学译丛”导言

“经济伦理学译丛”为中国读者提供一种新的视野,让他们了解将商务、经济、金融界同伦理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富有吸引力的领域。经济伦理学在中国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流行的话题,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巧合。在过去 20 年间,中国经历了空前的经济增长,也刺激企业获取更多利润的胃口。

但是,最近亚洲金融市场的风波戏剧性地动摇了对经济增长天真而又排他的信念。整个亚洲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看法,认为迅速增长的经济如果同腐败的政府行为和不诚实的企业实践有关,那么这种经济是很容易崩溃的。在许多亚洲国家,人们越来越相信,对于腐败,绝不能再把它作为“游戏的一部分”来容忍了。由于不诚实的交易,一些公司和政府部门不仅丧失了大量钱财,而且也丧失了他们的企业合作者的必要信任。腐败和经济违法行为是一对孪生兄弟。

因此,这套新的“经济伦理学译丛”满足了一种迫切的需要,为金融、经济、企业、文化领域里的研究者和业务人员同伦理学家之间的必要对话提供最新的信息。它旨在为中国的学术界和企业界提供一个观点框架,唤醒共同的价值意识,这对成功的企业经营非常必要。

经济伦理学最初创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并确立了在美国和欧洲的商学院管理教育课程中的地位。但是在中国,还有待于将这个综合了经济学、心理学、法律学、哲学的交叉学科变成每一个管理学学生的必修课。我们的第一本书是经济伦理学领域的开拓者理查德·德·乔治的著作,涉及广泛的重要问题,反映了多年来所做的全面工作中取得的成果。

这套丛书的目标是给人以有益的启发,裨益于那些在中国工作的人,使他们在不得不做出困难的决策但又经常感到孤立无援时得到一些启示。为了分析个案研究,我们首先必须依靠一套共同的价

值标准,使不同(家庭、信仰、文化等)背景的人们能够一起合作。如何才能使诚实、可靠、笃信、责任心等基本的人类价值观发挥作用呢?考虑到腐败的广泛反文化倾向,这个问题肯定不容易得到回答。但是,有鼓舞人心的迹象表明,中国政府现在正致力于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将越来越被作为一种绝对必要的事情来接受。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案——非法的厦门远华集体走私活动——被作为“游戏的一部分”来接受,那么中国所受的损失将不仅是在经济领域。经济伦理学必须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回扣和贿赂是再坏不过的投资,有一天会给你带来严重后果。经济伦理学这门新学科以西方和中国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康德、孔子、孟子、庄子)的重要观点为基础,同样是要证明,自古以来就有破坏人类尊严的非法买卖,如毒品交易,仅仅为了增加利润这个惟一的理由而使无辜的男女老少身心受到摧残。

经济伦理学的影响主要依靠不同领域——政府部门,企业,大学——之间人们的对话与合作。没有不得不在新的竞争氛围一方面造就一批赢家,另一方面增加大批失败者的“淘金热资本主义”氛围中寻求出路的人的不断反馈,一般的指导原则就绝不会有意义。

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一个法律体制还不够健全的环境中就显得格外迫切。

无疑,现在有越来越高的呼声,要求运用伦理标准。这套新的丛书反对某些悲观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中国改善道德标准是可以实现的:中国仍然有着巨大的伦理潜力,需要被更大规模地调动起来。人们期待着将世界不同智慧传统与中国对真理的追求结合起来的对话。那时候,经济伦理学将成为一种最终的挑战,使这种对一种恰当的伦理学的共同探索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得出具体结论,提出改善中国生活与工作条件的决定性实施方案。

此外,在中国,若干年以来关于如何将英语术语“Business Ethics”翻译成中文有过一场争论。许多研讨会及各种讨论与开会的结果是,最恰当的中文翻译应该是“经济伦理学”。“经济伦理学”是“经济发展”在它同道德哲学有关的重要方面,如必须被运用到企

业管理、金融、行政管理、生态政策、信息技术、劳动权利等领域里的责任、公正、诚实等概念在一切经济领域里的伦理反映。同时,最近在上海刚出版的《经济伦理学大词典》中关于这个词的界定和翻译,也可以作为本系列丛书之所以使用“经济伦理学”来表示“Business Ethics”这一英语术语的理由的佐证。

罗世范(Stephan Rothlin)

杨恒达

2001年12月于北京

经济伦理学译丛编委会

主任：杨恒达(Yang Hengda)中国人民大学

罗世范(Stephan Rothlin)北京理工大学

编委：刘曼红(Liu Manhong)中国人民大学

盖霍尔德·贝克(Gerhold Becker)香港浸会大学

多米尼克·梯尔(Dominique Tyl)台湾辅仁大学

乔治·恩德勒(George Enderle)上海中欧管理学院

张文定(Zhang Wending)北京大学

陆晓禾(Lu Xiaohe)上海社会科学院

金黛如(Daryl Koehn)美国圣·托马斯大学

中文版序

最近一二十年西方学术界所关心的“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差异问题”，首先是跨国企业所面临的实践问题：当公司穿过文化边界时，它们面临通常将导致价值观和伦理规范冲突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将导致误解和妨碍彼此交流，影响公司的效率。令西方跨国企业和西方学术界感兴趣的“亚洲价值观”，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东亚经济的崛起而更加引人注目。正如本书作者金黛如所指出：“随着亚洲市场的发展，企业界和哲学家对所谓‘亚洲价值观’的兴趣也相应地变得浓厚起来。人们认为，如果西方企业要使开放日本、韩国和中国市场的谈判成功，就必须了解亚洲价值观和伦理体系。实力政策在对亚洲价值观发生兴趣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随着这些发展中国家财富的增长，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愈益举足轻重。西方人现在不得不刮目相看亚洲人，并尽可能地去了解他们。”（《东方哲学给予我们的经济伦理学启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 年第 2 期）正是适应这种需要，有关“亚洲价值观”的文章书籍一时间成为西方出版界的一个热点。

就与企业实践关系密切的经济伦理学而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差异问题”最初是在国际商务伦理层次上展开的，是作为国际商务伦理问题提出的。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经济伦理学界要解决因而争论的问题是：跨国公司应如何看待和处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伦理规范差异？是“到罗马就做罗马人”即入乡随俗呢，还是“做一个正直的美国人”即坚持本国伦理标准？这期间美国出版了大量文章书籍，提供了处理这种规范差异的种种伦理准则；他们还就国际商务伦理共识举行了各种国际会议，形成了多种国际协议。然而，由“公司穿过文化边界”而引出的研究和争论并非仅限于经济伦理学领域的国际商务伦理层次。90 年代后，国际企业、经济学和伦理学界进

一步将这问题扩展到文化研究领域,并进而作为全球经济伦理问题而展开。而哲学、文化、宗教研究者以及政治家的参与,如亨廷顿、福山、汉斯·昆(Hans Küng)等知名学者有关全球文化全球伦理问题的论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亚洲价值观”的捍卫,也使有关这问题的研究和争论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展开。“由公司穿过文化边界”而引出的问题进一步发展成如下问题: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人类价值与行为形式最终汇合成一种世界文化,还是世界不同文化的汇合只发生在表层并未涉及不同的根本价值体系?这样,一方面,经济伦理研究和国际商务伦理研究促进推动了文化研究,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和问题;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又深化拓宽了经济伦理研究,致使“全球环境中的经济伦理学、组织设计和个人发展等的未来理论讨论和实践应用很大程度上在文化研究领域中进行”。最后,由“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差异问题”而引发的经济伦理研究文化研究还促进了哲学研究,例如有关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哲学问题的争论又在新形势下展开。

由于东亚经济的崛起,由于西方企业更多地在亚洲进行,因此,“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差异问题”,对有兴趣于亚洲的西方人来说,特别地表现为如何理解和对待“亚洲价值观”的问题,经济伦理的文化研究也特别在有关儒家、亚洲价值观等问题上展开,并引出了如下两个基本问题的争论:首先是,如何理解儒家、亚洲价值观等地域伦理特殊伦理的问题;其次是,能否以及如何从地域伦理特殊伦理达至全球伦理普遍伦理的问题。有关这两个问题的争论:1. 显示了东亚经济崛起的影响:“西方人现在不得不刮目相看亚洲人,并尽可能地去了解他们”;2. 表明了西方人意识到东亚经济从而经济背后的文化研究价值研究的重要性;3. 与殖民时期和冷战时期的“文化帝国主义”不同,西方主流经济伦理学者在这些争论中倾向于,在强调全球环境中达至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法律形式的重要性的同时,重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研究。

总之,由跨国企业发生的“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差异问题”促使这些国家的学术界从伦理、文化、价值观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并特别

重视对东方价值观的了解研究,以有助于西方企业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同时这些研究也进一步促进了西方学术的发展。

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作者不仅特别回应了经济全球化中的西方企业在东亚做生意的伦理规范需要,而且通过这种特别回应,具体探索了如何解决由上述“当公司穿过文化边界”而引出的经济伦理问题、文化问题和哲学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仅敏锐地把握了上述两个基本问题,还对有关争论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成果。

从西方企业的角度,作者考虑的基本问题是,应怎样理解那些生活在远东的人们的伦理,对西方人来说,究竟应从哪里着手?作者指出,有两种研究方法可供选择。一种是“宏观研究方法”,即假定有一个普遍的、所有亚洲人都具有的伦理。这种研究方法在西方“报刊和社会学文献中是习以为常的”。但她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1. 亚洲地区的文化极为多样,文化价值又变动不居,并不存在这样一套大一统的静止的亚洲价值观;2. 这种研究方法只是提供了笼统的价值观,并没有提供在这些价值观背后的思想,也不鼓励反思或更深地了解亚洲地区人们的伦理,因而无助于西方人真正了解他人和改善自己。另一种方法是“微观研究方法”,即她所捍卫和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具体考察由有影响的哲学家所提出的特殊的伦理论证。她认为,这种方法比宏观研究方法更富有洞察力和说服力,因为它可使西方人更深刻地理解某些亚洲人的伦理思想,还可指出从不同个人和文化达至普遍伦理的方式,从而避免文化相对主义。

本书第一至六章具体运用了这种方法。作者选择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和日本近代哲学家和辻哲郎作为微观研究的对象。后者的三卷本《伦理学》(1934~1949)构成日本近代伦理思想史上最庞大的伦理体系,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现代伦理思想的发展。作者认为,尽管他们并不代表所有中国人或日本人,但都深刻影响了各自文化的一些基本态度和习惯。因此,要理解中国人或日本人的经济行为,就有必要了解这两个人的基本思想。作者具体考察评析了作为孔子与

和辻哲郎伦理学基础的有关人性、信任和公共领域概念及他们对经济行为的意义。由于她提供的微观研究,现在西方人:1. 在了解东亚人的伦理时,有可能不再信任笼统的“亚洲价值观”,而是注意从具体国家有影响的伦理思想家,例如,从孔子着手来了解中国人;2. 由于诉诸的是特殊论证,注意的是背后的思想,因此,孔子与和辻哲郎的思想变得可理解和可鉴赏的,而不是原始和非理性的,因而使西方人能够认真看待亚洲智慧,从而能真正有所获益;3. 由于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比较分析的方法,使西方人也反思自己,从而改变独断论的态度。她这样说,“采取和辻或孔子的观点肯定不是治疗所有西方病的灵丹妙药。然而,认真对待这些传统,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的偏见,了解诸如信任这样一些可加选择的重要的思想概念。西方人也许并不想接受这些观念,但至少能够更好地做出何以应该拒绝它们的充分论证,并且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或日本企业家和哲学家对我们的传统可能提出的批评。”(同上文)4. 由于注重具体论证和背后的思想,读者会发现,她对我们所熟悉的孔子的许多论述的分析是令人赞叹的,提供了我们所不曾注意的独特的视角。正如长期在香港执教的贝克(Gerhold K. Becker 另有汉名为百里浩)教授所说,她的书优美地体现了她关于微观研究方法的主张,“这方法将使我们摒弃流行的套话,洞见东方重要的伦理思想。”

基于对孔子与和辻哲郎的伦理思想的评析,作者在最后一章对上述第二个基本问题即有否普遍伦理以及如何从特殊伦理达至普遍伦理的问题做了阐述。她指出,对孔子与和辻哲郎的伦理思想的分析表明,它们在某些方面可补充基于人权或德性的西方伦理。不过,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当它们与后者发生冲突时怎么办?通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独断论的:断言前者绝对优越于后者或者相反;另一种是相对论的:宣称根本就没有决定伦理问题的规则系统,不同民族有理由按照他们特殊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行动。她相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这道路尊重差异、允许个人有新的见解、但并不沦为伦理相对主义。她认为,孔子与和辻哲郎实际上指出了达到这种普遍伦理的道路。因此,西方人有充分正面的理由认真对待这些思想家,这不仅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许多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而且也可普遍伦理以及普遍经济伦理探明基础。

按她的理解,“普遍伦理不是以一套实质性的规范,而是以基于过程的指南为中心建构的。”换言之,作者并不归纳、抽象、提供一套为东西方文化所共同承认的伦理规范,如许多人仍然试图做的那样,而是用孔子与和辻哲郎的伦理学来阐述一种对西方人陌生的普遍伦理概念,这概念是一种承认和包容差异的伦理理想,是一种达至这种伦理理想的实践指南。它包含如下重要思想:1. 普遍伦理不是同而是异,它是以没有高下之分的多样善为前提为基础的;2. 处于多样且通常是冲突的善的境遇中的个人是决定伦理善行为和选择的标准,他们在认识和处理这些多样冲突的善的过程中,并不只诉诸一种标准或典范,而是在与所涉及个人的对话协商中将这善置于恰当的位置,“美德就表现在不同意见的可能性中”;3. 由于普遍伦理是尊重和容纳差异的过程,因此与西方伦理学通常所理解的不同,恶并不在于违背某种伦理规则,而在于谎称只存在一种善。作者最后还具体说明了由多样善构成的普遍伦理如何解决跨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问题。

概言之,作者主张对地域伦理特殊伦理采用微观研究方法,通过了解个人是如何思考的,以有助于了解这地方的人是如何思考的,因此,她不仅否定了抽象笼统的宏观研究方法及其“亚洲价值观”,而且否定了唯西方话语权论:“西方人如果不是坚持用人权的语言,而是用孔子的语言,就能更好地倾听中国人说什么,同时克服自己的不足。”不仅如此,她对个别思想家的微观研究还论证了通向普遍伦理的道路,以否定相对主义、独断论并超越有关同质世界的争论。如果普遍伦理以差异为前提为基础,那么就要认真对待地域伦理地方文化,就要尽可能寻求和尊重不同观点和多种善,就不可能只诉诸一种伦理标准,世界文化全球伦理就不可能西方同质论。当然,作者对于原则伦理学的理解和批评是否恰当还可以讨论,但她用孔子与和辻哲郎来论证的普遍伦理概念,对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差异问题的争论确实提供了精彩而独特的新观点。

本书不仅对西方读者具有启迪意义,而且对中国读者也有参考价值。首先,本书将有助于我们深化有关全球经济伦理问题的争论。国内有一种看法,因经济全球化有鲜明的西方伦理价值取向而否定全球经济伦理命题的可成立性。经济全球化当然不单是事实问题,还有价值判断问题,并表现有强烈的西方伦理价值取向,但这并不成为否定全球经济伦理命题的根据。对西方企业来说,例如在中国“应如何行为”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同样,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也面临类似问题,因而在跨文化地域应如何行为、有否普遍伦理全球伦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经济全球化还扩大了贫富国差距和不平等经济关系,但这也不能成为全球经济伦理是虚构伦理的根据。用马克思关于英国资本主义变革过程的话来说,“它[这过程]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就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来看,如果它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表现的一部分,“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那么这过程究竟“采取较残酷还是较人道的形式”,同样要看我们自身的发展程度包括在经济伦理方面的努力。因此讨论全球经济伦理,争取我们在全球经济伦理建设中的话语权就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将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社会“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资本论》第一版序)。就此来看,本书作者的微观研究将有助于西方人认真地看待我们的伦理话语权,她的尊重地域差异的普遍伦理概念也可为我们所用,争取经济全球化中的多元伦理价值取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其次,本书将有助于我们对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宏观研究方法”的反思。西方经济伦理学成果也是西方公众、学术界以及企业界过去近30年经验教训的总结,无论从“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同上书序),还是从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对手”意义上看,将西方经济伦理学成果简单笼统地作为“单边主义伦理”而加以否定拒斥,都是不恰当和无益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应认真对待他们的伦理成果,或者不妨也用“微观研究方法”,从他们的有影响的伦理学家个人入手,借用作者的话来说:我们也许并不想接受这些观念,但至少能够更好地做出何以应该拒绝

它们的充分论证,并且能更好地理解他们对我们的传统可能提出的批评。最后,本书还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伦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伦理建设中的作用。中国在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如何对待中国传统伦理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儒家文化是目前市场经济伦理问题的深层原因,必须对文化传统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抛弃儒家文化。本书作者通过对孔子及其对当代西方企业实践意义的分析,论证了儒家伦理的某些方面可补充基于人权或德性的成熟的西方市场经济伦理并导向一种尊重差异的普遍伦理概念,从而可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对孔子以及传统伦理文化的态度和争论。有必要指出的是,需要具体分析,不仅是孔子和中国古代传统伦理,还有过去 50 多年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伦理。当然这方面的工作更应由我们自己来做。

本书作者现任美国圣·托马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Thomas)卡伦经济伦理学教授(Cullen Chair of Business Ethics)、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在线伦理学杂志》(*Online Journal of Ethics*)主编、美国“经济伦理学会”(Society for Business Ethics)会长(2002~2003),还任《经济伦理学季刊》(*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生意与社会评论》(*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等刊物的编委以及国内外多所研究机构的特约研究员和客座教授。她学识渊博,能广泛深入和敏锐地涉及许多前沿课题,伦理学方面,属于美国德性伦理学派知名学者,特别是信任问题的研究专家。她在经济伦理学和职业伦理学方面发表有大量著述,一些已被译为其他文字。除本书外,还发表有:《职业伦理学基础》(*The Ground of Professional Ethics*, 1994)、《生意与信任:障碍与桥梁》(*Business and Trust : Barriers and Bridges*, 1997, 中译本, 2003);《重新思考女权主义伦理:关爱、信任、同情》(*Rethinking Feminist Ethics: Care, Trust, Empathy*, 1998)和《公司治理:全面的伦理》(*Corporate Governance: Ethics Across the Board*, 2000)

我认识金黛如教授多年,本书初稿曾寄给我看过,书中还引用了我的文章《论经济价值与伦理价值》和《经济全球化与企业价值取

向》。我也欣赏她的许多富于思想的独立见解。她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尊重中国和亚洲文化,对中国态度友好,发表过多篇研究中国伦理的文章,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对解决当代经济伦理问题的重要意义。我曾译介过她的多篇文章和《生意与信任:障碍与桥梁》一书。现在,很高兴罗世范教授组织翻译出版她的这部最新重要著作,衷心希望她的研究成果能引起我国经济、管理、伦理、哲学、文化等多领域研究者和从业者的兴趣,从而为使中国文化与世界不同智慧传统一起促进中国和世界的繁荣昌盛与公正和平而做出我们新的贡献。

陆晓禾

2003年7月于上海社会科学院